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 学习指导

韩传达 谢虹光 编著
张志强 关龙艳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学习指导 / 韩传达, 谢虹光, 张志强, 关龙艳
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

ISBN 7-301-08655-5

I. 中… II. ①韩…②谢…③张…④关… III.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电视大学-自学参考资料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8257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学习指导

著作责任者: 韩传达 谢虹光 张志强 关龙艳, 编著

责任编辑: 谭 艳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55-5/I·071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河北涿县鑫华书利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2.125 印张 330 千字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编写说明

一、根据《教学大纲》、《教学一体化设计方案》和学习的实际需要,我们编写了《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学习指导》。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导读与简析;文论选读译文;分编综合练习题;期末自测题;附录。

二、《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学习指导》编写的原因是,在教学实践中,学生反映文论的原文比较难读,其理论内涵也比较难理解,需要像其他课程一样,有一本指导学习的参考书;编写的目的也是希望借此帮助同学们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和学习重点,以便于学习和复习;编写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古代文论选读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国历代文论精选》,以及主讲教师的讲授;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编写者也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

三、“导读与简析”是以比较通晓的语言对教材的重点难点进行解析,虽然主要参考了教材,但不株守教材的观点,目的只为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因此,不作学术的深究和考证。

四、“文论选读译文”也是应学生要求编译的,由于许多学生古文阅读能力较弱,希望能提供译文,以帮助他们读懂原文。译文尽量忠实原文,努力做到信、达、雅。阅读古文,特别是古代文论,主要应该研读原文,译文只能,而且仅仅只能作为参考。其中的“提示”,只是编译者的理解,也仅供学生参考。“提示”形式,有加在原文篇末的,有加在段落之后的。只依译者自己的处理,不作统一要求。

五、“分编综合练习题”按照时代顺序编写,只提供题目,没

有答案,可供学生平时学习练习所用。

六、“期末自测题”也按时代顺序编写,有题目,有计分,供学生期末复习时自测。学生可以自我检测自己的成绩。“期末自测题”和“分编综合练习题”的题目没有刻意避免重复。

七、“附录”附上一些资料 and 文件。

八、编写者有中央电大韩传达老师、山西电大谢虹光老师、哈尔滨电大关龙艳老师和汕头电大张志强老师。统一原则,统一要求,分工合作,文责自负。

九、编写时主要参考教材《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在此,对主编张少康教授,主讲卢永璘教授和该书的作者表示感谢;同时也吸纳一些学者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和论文的理论观点,由于行文所限,不能一一列出书名和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十、由于编写时间仓促,难免有缺点、错误之处,希望得到各地广播电视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批评指正。

目 录

编写说明.....	(1)
导读与简析.....	(1)
文论选读译文	(98)
分编综合练习题.....	(252)
期末自测题.....	(297)
附录	
附录一: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简析	(309)
附录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索引选录	(321)
附录三:《中国古代文论选读》教学大纲	(372)
卷后语.....	(380)

导读与简析

先秦

✓1. 《论语》的“思无邪”说

《论语·为政》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提出了“思无邪”的文艺批评标准。“思无邪”是指《诗》的思想内容具有雅正的特点。从审美方面看，“思无邪”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诗经》中的作品起初不仅关涉内容(歌词)，而且与音乐有紧密的关系。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符合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审美特征；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思无邪”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千百年来成为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

✓2. 《论语》的“兴观群怨”说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论述文学作品的作用时提出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简言之，“兴”，就是说诗歌的艺术形象可以引起人的联想，使之思想受到感发，激发人并使之精神兴奋，情感波动，从而获得审美享受；“观”，是指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政治得失、道德风尚状况和诗人的主观意图的作用；“群”，则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和谐人际关系，能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强调了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不良的社会政治现象。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对文

学的社会作用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传统的形成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3. 孔子“诗可以怨”在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中的意义与影响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了“诗可以怨”的观点。“诗可以怨”的主要内容是认为诗能“怨刺上政”(《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实际上是说诗歌可以对现实中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讽刺和批判。像《诗经》中就有许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讽刺、批判和揭露,如《魏风》中的《硕鼠》、《伐檀》,《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劳》等作品。

孔子“诗可以怨”的理论,肯定了文艺应该干预政治、批判现实、关心民生的作用,对我国后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批判现实的优良传统。

从诗歌创作看,后世的许多诗人常常在主观或客观上把“诗可以怨”作为自己创作的主要内容或主要追求目标,用它作为批评和揭露黑暗现实的武器。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的干预政治现实的作品,唐李白“哀怨起骚人”,宋陆游“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清龚自珍“泄天下之拗怒”等等。现代许多进步诗人,如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等人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诗歌都可以说是受到了“诗可以怨”的影响。

从诗学理论看,“诗可以怨”是文学批评史上批评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和论题,后世的文学理论家常常用它作为反对文学脱离社会现实或缺乏积极的社会内容的理论依据。例如,刘勰针对缺乏怨刺内容的汉赋提出:“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在唐代兴起的反对齐、梁遗风的斗争中,诗人强调诗歌的“兴寄”以及唐代新乐府作者所强调的“讽谕美刺”和“补察时政”的作用,都继承了“诗可以怨”重视文学社会

功能的传统。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黄宗羲的《汪扶晨诗序》及其他许多作家的文学主张中,还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巨大影响。

4. 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的文艺主张,语出《论语·季氏》,是孔子教育儿子孔鲤时所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而是说通过学习《诗》,可以加强言词应对和表达能力。

孔子所言之“诗”,不是泛指一般的诗歌,而是专指《诗经》。《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较广泛地反映了商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思想状况,其中有很多做官、做人、治国、齐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常识可供后人参考。所以,春秋时代《诗经》不仅被看作政治教科书,而且其中的篇章辞句,在当时上层社会的交往中也被经常引用。尤其是在诸侯国之间的一些外交场合中,各国外交人员为了较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是经常吟诵《诗经》中的诗句来进行对答。当时甚至有因吟诗不当而导致战争的情况。由此可见,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当时并不夸张。作为语言表达,“言”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口头语言,这当然不是一般的说话,而是指上层社会中的交际应付,同时也有把话说得好一些、文雅一些的意思;再就是书面语言,学习了《诗经》对写文章也有帮助,如《孟子》、《荀子》等都经常引用《诗经》中的某些章句来作为他们论证问题的论据。

“不学《诗》,无以言”的主张,强调了文学的教育功能,反映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关系。这种文学艺术上的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中有着普遍的规律。它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 孔子的“辞达”说与“文质彬彬”说

孔子在论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尤其是语言)及其关系时,主

张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他的“辞达”说和“文质彬彬”说曾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

孔子很重视言辞表达及其技巧，认为“情欲信，辞欲巧”（《礼记》引孔子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语），但总体上，孔子并不主张过分的文饰，如他在《论语·卫灵公》中说：“辞达而已矣。”“辞达”说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作品的内容就可以了，不必徒事与内容无关的文饰。与“辞达”说相联系的是孔子的文质说，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他认为人的外在仪表（文）与人的内在品格（质）要兼美。孔子关于文质的论述，后来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成为要求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基本理论，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6. 孔子论雅乐与郑声

孔子提倡雅乐，反对郑声。《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从音乐的角度来看，雅乐就是古乐，其曲调平和中正，节奏缓慢，常用以表现古代先王功业，如《韶》、《武》与《诗经》中《雅》、《颂》的配乐。郑声则实际上是指当时的新乐，其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容易激动人心。孔子认为雅乐可以陶冶人的正而不邪的思想感情，而新乐任其感情之自然发展而无所节制，容易诱发人们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以仁、礼为内容的道德品质，所以要禁绝之。孔子把雅乐比作正人君子，把郑声比作谄佞小人。这种反对郑声，提倡雅乐，崇尚雅正的思想是儒家文论的基本观点，也是孔子文艺思想上比较保守方面的集中表现，是不合乎时代潮流的。孔子贬斥郑声新乐的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看不起民间新文艺，把戏曲、小说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低贱之作的重要根源。

7/ 孔子文艺思想的审美特征

要求文学作品“尽善尽美”，雅正中和，是孔子文艺思想的主要审美特征。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了“尽善尽美”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善”的具体内容，是他的仁政德治及以仁义礼乐为中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如何才能“尽善尽美”呢？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又说：“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从艺术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雅正中和之美。《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从音乐上讲，“和”是指乐曲中正平和，也即儒家传统雅乐的主要美学特征。从文学作品来说，它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要过于激烈，应当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孔子追求“尽善尽美”、雅正中和的文艺思想，体现了他以“诗教”为核心的文艺观。

8. 孔子文艺思想对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积极影响

孔子文艺思想的核心是被儒家后学们概括发挥成的“诗教”说。所谓“诗教”即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之间的联系，其基本观点是肯定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文艺应该为人的道德修养，为国家的政治教化服务，并且能很好地服务。

孔子的文艺思想表现了其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世品格。这种经世致用的文艺观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奠定了基础，对文学干预现实、干预社会提供了理论根据。后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批评可以说无不受孔子功利性的诗学观、文艺理论观的积极影响。

9.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

《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的“浩然之气”是指人的仁义道德修养达到极高水平时所具有的一种正气凛然的精神状态。作为文学理论批评的用语，“知言养气”是指，作者必须首先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从培养自己的道德品格入手，具有了高尚的人格即养成“浩然之气”后，才能有美而正的言辞，写出好作品。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

“知言养气”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属于文学理论批评，但这个“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注重气与言、身心修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其影响都是积极的。

10/ 孟子“以意逆志”说

孟子在《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提出了“以意逆志”说。这里的“意”当是指读者之意，而“志”则是作者的思想意志。所谓“以意逆志”，是指说诗者（即读者）要根据自己的历练、思想意志去体验、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抠字眼，也不要受拘束于词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从现代文学批评观念来看，“以意逆志”涉及了文学批评的基本方面：文本（“文”、“辞”）、作者（“志”）、批评者（“说诗者”、“意”），并对三者之间的基本矛盾作了相对辩证的处理，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

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11.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

“知人论世”说是孟子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是要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有所了解；论世，是说对作家作品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认识，这样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为友，体验作者的思想感情，准确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正确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知人论世”说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定时代的产物，结合作者的生平来进行考察，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以这种方法解说《诗》中的一些作品，比较接近和还原了它们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大抵是在此原则下展开文学批评和记录读后感想的。

12.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作为文学批评方法，与先秦时期“赋《诗》言志”对于《诗》的阅读、理解的不同

据《左传》等典籍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在诸侯朝聘、社会生活中流行“赋《诗》言志”现象，即以诵读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诵诗方法或割裂全诗，断章取义；或曲解诗意，穿凿附会；或对诗句作表面的机械的理解，以附和自己的主观意志。“赋《诗》言志”的说诗方法常常对诗的解读造成很大的误导。

孟子切中时弊，提出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说。“以意逆志”是说读者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解释诗的人不能以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诗本意的认识，应当以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知人论世”则是指要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就应当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思想、作品的时代背景。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

说是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和作品解读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大量诗话、词话等大抵都是运用这一原则进行文学评论和批评的。

13. 孟子民本思想在其文艺观中的体现

孟子在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和“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孟子“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正是在他“仁政”与民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是以他的人性善理论为哲学基础的。《孟子·梁惠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孟子将以百姓之乐为乐,以百姓之忧为忧,作为衡量一切艺术作品的标准,看它能否“与民同乐”。从“与民同乐”思想出发,孟子重视古乐,不轻视今乐,只要能“与民同乐”,则今乐也是古乐(《孟子·梁惠王》:“今之乐由古之乐也。”),所以古乐、今乐都要重视。孟子发展和革新了孔子的音乐思想,与孔子偏重古乐的观点有所区别。

14. 孟子文论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影响

孟子文论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 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对儒家文学思想的发展;2. 其“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说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比较客观实在的批评原则,后世大量的词话诗话大抵都是在此原则下进行文学评论和批评的;3. 其“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内在最本质的蕴涵,被后人在文论中广泛引用和运用,形成了中国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

15. 庄子的“虚静”说

“虚静”,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最早见于

老子《道德经》中“致虚极，守静笃”的说法，指的是人在认识外界事物时的一种静观的精神状态。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虚静”的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大宗师》说：“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的“坐忘”就是“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经验，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不为外物所乱，不为心知所蔽，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也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庄子的“虚静”说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上的重要特点，即重在内心的体察领悟，而不重在思辨的理论探索。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对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有重大影响。

16. 庄子的“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相联系的。庄子认为“虚静”是认识“道”的途径和方法，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从创作主体来说，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这是能否创作合乎天然的艺术之关键。而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来说，必须要达到“物化”的状态。什么是“物化”呢？在庄子看来，进入“虚静”状态之后，人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就会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从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物我两忘，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17. 庄子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

《庄子·天道》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

传也。”在庄子看来，“意”是“不可以言传”的，《庄子》中一些出神入化的技艺的故事，如“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等都在说明言不能尽传意的道理。《庄子》认为文字语言都是有局限的，不可能把人的复杂的思维内容完全传达出来，这就是所谓“言不尽意”。既然“言不尽意”，那么，相比于意来，言就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得意忘言”说。“得意忘言”是庄子解决言不尽意然而又要运用语言文字的矛盾之基本方法。

“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虽然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并且，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因此，它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8. 庄子言意关系论对于诗歌意境论的启迪

在庄子看来，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的，即“言不尽意”，他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庄子对“言不尽意”这种客观存在认识得十分深刻，他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表达人的思维内容的物质手段，是带有概括性和抽象性的，难以表达人的全部思维内容。因此，在《庄子·外物》篇中提出了“得意忘言”说来试图解决“言不尽意”问题。他把语言作为“得意”的工具，通过利用有限的语言可以表达的方面，又不拘泥于语言文字，借助比喻、想像、象征、暗示等方法，发挥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去联想、想像、领悟无限的“言外之意”，以获得比语言文字已经表

达出来的内容更加广阔的内容。

庄子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有深远的影响。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不要求“言尽意”，而是需要语言含有不尽之意，让读者用自己的经验、体会去思考、回味，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诗歌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19. 庄子崇尚自然的文艺美学思想在文学史上的积极影响

庄子哲学本身崇尚自然，主张清静无为。因此，在文艺美学思想上，庄子派把崇尚自然、反对人为作为其文艺美学思想的核心，作为其审美标准和艺术创作的原则。《庄子》明确提出要“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否定和取消了人的智慧和创造，将尊重自然绝对化，这无疑存在着片面性，但《庄子》中的一些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无不阐发其艺术创造的精辟思想，即艺术虽也是人工创造，但因其主体精神与自然同化，因而也绝无人工斧凿痕迹，从而达到天生化成的境界。后世受《庄子》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批评家也都把这种境界作为对文学评论的一个标准，不是否定艺术创造，而是重视那种无人为造作之迹的合乎天然的艺术创造，即反对雕琢堆砌，主张淳朴无华，反对矫揉造作，主张天然化成。这是《庄子》崇尚自然的文艺美学思想对后代文学艺术家艺术创造影响的主要方面。

20. 庄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重要贡献

(1) 从创作主体角度提出了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

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虚静”学说，认为它是进入“道”的境

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虚静”，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弃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才最为旺盛，才能创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

“虚静”的认识论体现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上的重要特点，即注重内心的体察领悟，不注重思辨型的理论探索。它揭示了审美和文艺创作中主体心灵的超功利特点。庄子的“虚静”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庄子的“虚静”说的影响。

(2) 从创作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提出了“物化”说。

庄子的“物化”说是与他的“虚静”说联系的。在庄子看来，创作主体进入“虚静”状态之后，就会抛弃了一切干扰和心理负担，不再受自己感觉器官的束缚和局限，从而达到认识上的“大明”。作为创作者来说，主体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体的“自然”(天)和客体的“自然”(天)合而为一，这就是进入了“物化”的境界，这就叫做“以天合天”。处在这样状态下的创作自然就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物化”思想在审美领域和文艺创作领域，无疑是一个相当精辟的理论，因为在真正的高层次的审美和文艺创作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必须做到异质同构，泯灭彼此之界限，这也就是后世许多文论家常说的神与物游、情景交汇、意境融彻。

(3) 从创作方法角度，提出了“得意忘言”说。

“得意忘言”是庄子对言意关系的看法。在庄子看来，语言是不能完全表达意思的，即“言不尽意”。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因此，庄子提出用“得意忘言”来解决“言不尽意”的问题，把语言作为“得